



《墨子》城守诸篇研究的新突破

——读史党社《〈墨子〉城守诸篇研究》

王 辉

(陕西省考古研究院, 陕西 西安 710054)

墨子是先秦时代的重要学术流派,其创始人墨翟,春秋战国之际游历宋、齐、鲁与南楚之间,聚徒讲学,提倡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节葬、节用。为了反对非正义战争,墨翟曾亲至楚都郢,与公输盘演练攻守之术。战国中后期,墨分为三,成为当时的显学,有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,即东墨、南墨、秦墨。《墨子》是墨家学派著作的总汇,其中《备城门》以下二十篇(现存十一篇)为秦墨作品,主要内容为对多种攻城之法的防御,物资人员的调度及其法令等,也间杂有祷性、望气等军事迷信,习称“城守诸篇”。秦汉以降,墨学研究衰,直到清代中晚期毕沅、孙诒让之后,方有起色。城守诸篇因言防御之术,十分难读,历来不受重视。1948年,栾调甫先生《墨子城守各篇简注》出版,情况才有所改观。20世纪初,河西汉简大量出土;特别是1972年,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《守法》、《守令》诸篇,1975年,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多种秦简法律文书,有些与城守诸篇吻合或相似,劳干、陈梦家、陈直、李学勤、加拿大叶山等先生著文讨论,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。但城守诸篇文字多错、讹、衍、漏,有多战国军事术语,不易索解,所以任有不少问题,有待深入研究。史党社先生研究秦文献,秦史有年,成绩卓著,是秦俑博物馆的青年才俊、学术新星。近十余年来,他一直集中精力,对城守诸篇作校勘、注释,并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其源流、价值,其最新研究成果,即2010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〈墨子〉城守诸篇研究》及即将出版的其姊妹篇《墨子城守诸篇校注》。我今日拜读前书一过,深感其资料全、视野阔、开掘深、观点新,是该研究领域的新突破。

校释古籍、研究学术史,对已有资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搜集,须揭泽而渔力求其全。在这方面,党社是做的极好的,他不但搜集了《墨子》的各种版本、清代至今以及

日本、欧美学校和研究城守诸篇的书籍、论文,对有关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及银雀山汉简《守法》、《守令》等篇的研究成果也多有考索。为此,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即以版本而言,本来已有吴毓江《墨子旧本经眼录》、顾实《墨学书目考》可供参考,担当社并不满足假手转引,而是多次到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西北大学图书馆、陕西师大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等访求,照像、复印、摘录,仔细比较其优劣。这种工作,看似迂远,但百尺之台,起于垒土,没有这个基础,所谓研究,就只能是空中楼阁。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内容、用词习惯与城守诸篇多相合,李学勤先生《秦简与〈墨子〉城守各篇》已举多例,史著在此基础上更作全面梳理,并补充了龙岗秦简及其他秦文字材料的例证,列举72例,大大丰富了比较的内容。《墨子·号令》:“分里以为四部,部一长,以苛往来不以时行、行而有他异者,以得其奸。”“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闾巷、官府,吏、三老阁者失苛心<止>皆断。”睡虎地简《田律》:“河禁所杀犬,皆完入公。”同样的话又见龙岗简,“河”读为呵;《号令》之“苛”亦读为呵,孙诒让已言之,秦简证明孙说不误。“公”又见秦兵器,意为官府。《号令》:“诸行赏罚及有智者必出于功(公)。”“功”及上文“心”道藏本如此,毕沅本已改作“公”、“止”,但毕氏只是“以意改”,无他本异文佐证;简文及兵器铭文证明毕改是,也证明城守诸篇是秦人著作。这只是一个例子,但也可看出,史著的结论都是在收集大量例证的基础上得出的,是可信的。

史著研究城守诸篇,但绝不局限于诸篇,而是将其至于墨学研究这样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下。第一章探讨“二千年来的墨学——从‘役夫之道’到周秦显学,再从‘隐没’到‘中兴’”、“墨离为三”、“墨侠之辨”、“墨

学在秦”等有关墨学流传的大问题，似乎与城守诸篇关系疏远，其实不然。正因为墨翟及其后学多出身社会下层，《荀子·王霸》鄙其学说为“役夫之道”，所以才反对非正义战争，擅长守城技术，也才有城守诸篇这些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想成份的作品。三墨之分在战国中晚期，学者无异议，但其活动地域及各派特色则诸说不一。蒙文通先生说：“三墨者，即南方之墨，东方之墨，秦之墨。秦之墨为从事一派，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，南方之墨为谈辨一派，此墨离为三也。”城守诸篇托于子墨子与禽子的问答，即为明证。《吕氏春秋·首时》记秦惠文王时，墨者田鸠入秦，秦又有墨者巨子腹（黶），禽子、田鸠都是齐人，所以秦墨与东方之墨在师承上都与禽子有关。由此，党社得出结论：“城守诸篇，大约是较早形成的东方墨者作品与秦墨作品的合编。”明乎此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城守诸篇何以有秦法家的法制主义特色，以及汉简本《守法》、《守令》何以出于齐地临沂，因为“竹书《守法》可能与城守诸篇有着共同的来源，及东方齐、鲁、宋、卫一带墨者的作品”。

对城守诸篇内容，党社都不是浅尝辄止，而是向纵深开掘，以揭示其义蕴。《迎敌祠》、《号令》二篇有兵阴阳家色彩。《迎敌祠》：“敌从东方来，迎之东坛，坛高八尺，堂密八，年八十者八人，主祭青旗。青神长八尺者八，弩八，八发而止。将服必青，其牲以鸡。……敌从北方来，……”说的是迎四方之敌的巫术，迎敌祈胜于东方青神、南方赤神、西方素神、北方黑神，且与坛、主祭者、旗、将服等之数及颜色相配。相似内容见于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、《礼记·月令》、《新书·胎教》，但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比附，复引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、

《礼记·内则》、《山海经·海外经》、《淮南子》，以至马王堆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的祝由术、居延破城子汉简、汉代镇墓石文、吐鲁番阿斯塔墓唐代方书，讨论四方神的渊源及其历史影响。这样的讨论，无疑加深了我们对城守诸篇的理解。

史著尽可能吸收了已有研究成果，更在很多方面有其全新见解。在《韩非子》的《五蠹》、《显学》诸篇中，“儒墨”、“儒侠”对举，且墨家有“以力助人”的主张，有武侠的传统，因之前贤多认为墨即是侠，或侠出于墨，清代的陈澧、近现代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冯友兰等都有此主张。党社力排众议，独标新说，指出：“战国时代，‘以自苦为极’，拥有兼爱、非攻和守小国理想的墨家集团，与带剑的游侠，存在着较大的差别。游侠……的行动，最多可算作一种‘私斗’，与墨家决然不同。游侠行事的无组织、无纪律性，与墨家的严密的纪律性，也是相互抵触的。……墨侠之界，决然而清晰，不容混淆。”类似的例子，书中俯拾皆是。

当然，史著个别地方似还可以稍加改进：

1. 有少数资料还可略加补充。如第六章第68例说《备城门》、《迎敌祠》的“守”即《号令》的“太守”，此习惯亦见睡虎地秦简，《封诊式》有“太守”，《法律答问》有“郡守”。可补充者，秦兵器有“上郡守”、“蜀守”、“汉中守”等数十件，秦封泥有“四川大（太）守”、“太原守印”等。

2. 引文应依通例，即残文以意补足者加[]，通假字加（ ），讹误字加< >，不能一律加（ ）；或把原字放在（ ）中，把通假字放在（ ）外。